



by Lord Acton

# 法国大革命讲稿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 阿克顿/著 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 秋 风/译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公法  
GONGFA YICONG  
译丛

贵州人民出版社





by Lord Acton

# 法国大革命讲稿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 阿克顿/著 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 秋风/译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公法  
GONGFA YICONG  
译丛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讲稿/(英)阿克顿著;秋风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5

(公法译丛)

ISBN 7-221-06558-6

I. 法… II. ①阿…②秋… III. 法国大革命(17  
89~1794)-研究 IV.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18 号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曹琼德

技术设计:黄筑荣

## 法国大革命讲稿

[英]阿克顿 著

秋 风 译

---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话:6828637

邮编:550001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32 889×1240mm

印张:14.37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221-06558-6/K·805

定价:30.00元

## 原编者注

下面的讲稿系阿克顿爵士担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之时,于 1895—1896、1896—1897、1897—1898、1898—1899 学年授课所用。1789—1795 年间的法国大革命,是当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特别科目之一,这就决定了这些课程的时间范围。而关于大革命的文献的讨论,通常是在谈话式课堂所讲,或单作讲座讲授。还有一些相关散篇,汇集起来作为附录印出。各讲的标题,均系编者所拟。

J.N.F

R.V.L

1910年8月10日

# 目 录

第 一 章	革命的前奏	001
第 二 章	美国的影响	022
第 三 章	三级会议的召集	041
第 四 章	三级会议	060
第 五 章	网球场誓言	072
第 六 章	巴士底狱的陷落	081
第 七 章	8月4日	100
第 八 章	宪法大辩论	116
第 九 章	进军凡尔赛	134
第 十 章	米拉波	151
第 十 一 章	西哀士与《神职人员民事宪章》	170
第 十 二 章	逃往瓦朗纳斯	187
第 十 三 章	斐扬派与战争	207
第 十 四 章	迪穆里埃	226
第 十 五 章	君主政体的毁灭	241

第十六章	国王之死	258
第十七章	吉伦特派的垮台	275
第十八章	恐怖统治时期	289
第十九章	罗伯斯庇尔	306
第二十章	旺代厄	324
第二十一章	欧洲战争	341
第二十二章	大恐怖之后	357
附 录	阿克顿教授	372
	阿克顿爵士论革命	415
译者后记		430

# 第一章

## 革命的前奏

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 2000 万了,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中,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 1 亿,尽管如此,国民收入也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一个阶层,而古老的贵族却拒绝给予这个阶层以奖赏,他们剥夺了这个使国家繁荣富裕的阶层的权力。他们的勤奋使得财产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财富不再只是少数人独有的特权,因而,这些被排斥的多数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是因为社会不是建立在正当与正义的基础上的。他们提出,政府、军队和教会的奖章应该颁发给社会中比较积极的、为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人们,而那些不劳而获的少数人,不应该再保留任何伤害他们的特权。由于双方的比例差不多是一百比一,所以他们认定,他们事实上已经是国家的栋梁了,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力,要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提出,国家应当进行改革,统治者应当是他们的代理人,而不能是他们的主子。

于是,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它并不是一颗自无人知晓之处飞来的流星,而是各种历史力量汇集的产物;这些力量如

果联合起来,就具有足够强大的破坏力,但如果分开来,却疲软得没有任何建设的力量。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必须稍事追溯一下那个时代之前涌现出的种种观念,而这些观念也服从连续性的法则,是一种持久发挥作用的力量。

如果说法国人在其他国家成功的地方失败了,如果说法国从封建和贵族制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轨出现了反复,那根源也不在那个时代的人,而在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只要专制的国王们在国外获胜,在国内,他们也能被民众接受。革命思想的第一个信号朦胧地潜藏在大灾难间隙期间被压制的少数人中间。詹森教派信徒(Jansenist)是忠诚的,也是具有忍耐力的;但他们中的著名的法学家多马(Domat)是一位哲学家,我们也都知悉,他是一位学者,他在那个时代混乱不堪的法学领域恢复了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他从圣·托马斯(St. Thomas),他所属的那个教派的一位伟大人物那里知道,立法应当服务于人民,也应当由人民来立法,废弃一位恶劣的国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人们的义务所在。他坚持认为,法律应当来自于判断力(common sense),而不是来自于习俗,应当从永恒的法典中获得其律令。高级法的原则具有革命的意义。任何政府的实证性法令都必须在经受过这一原则的检验后才有效力,它指出了通往那种不证自明的、普遍的、不可废除的权利体系的一条道路,在多马之后,国民议会的法律家们将这一体系写进了宪法中。

法国国王在颁布南特敕令(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法国西北部城市南特颁布的一道敕令,指认天主教为法国国教,但承认属于新教的胡格诺派享有信仰自由,可以出任官职——译者注)之后,新教徒成了铁杆保皇主义者;因而,即使在撤销该敕令之后(指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除



南特敕令——译者注),一位热心鼓吹宗教宽容的人士贝勒(Bayle)在流亡鹿特丹之际,依然对国王忠心耿耿。他的对手儒里厄(Jurieu),尽管作为神学家不怎么宽容,但在政治上则是位自由主义者,由于跟奥兰治的威廉过从甚密,具有了某种大陆辉格党人的气质。他的学说是,主权来自人民,并归属于人民。那些滥用权力的国王的权力应当被褫夺。国民的权力是不可能被褫夺的。只有人民拥有某种无条件合法的权力,即使在他们作恶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儒里厄的煽动性言论经常被人谈及,这些话保留在博絮厄(Bossuet)那些显然预示着危险的回信中,也能成为经典留之永恒了,总有一天,它会催生出下面的理论:民主制度是不用承担责任的,一切都须为其让路。

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教会法律家莫尔特罗(Maultrot)在1790年发表了一部论述人民的权力高于国王的三卷本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深入地研究了他自己非常熟悉而别人不怎么熟悉的文献,说明了教会法规是如何支持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诸原则而反对现代的神授权力观念的。他的著作可以很好地解释教士们在大革命期间的心态,这些著作也曾经风行一时。

不过,文学领域中反叛思想的真正的创始人是费纳隆(Fénelon)。他既不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改良家,也不是新真理的发现者;但他是一位特立独行而又聪敏过人的见证人。他洞悉了宫廷中冠冕堂皇的虚伪,并且断言,法国正走向毁灭之路。在君主的荣耀被阴云遮蔽之前,他就开始了良心的反叛。他的观点源于他在判断人时的过人的敏锐和细腻。对于政府的问题,像对待私人生活中的行为一样,他都根据纯粹的道德标准进行判断,并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定地根据文明的美

德来判断一切问题,这种做法很朴素,但也相当危险。尽管他对政策和国际关系科学一无所知,但他总是能够告诉人们,设想中的那些完美的人会怎么做。费纳隆觉得自己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公民,但他循着自己的思想而越出他的国家和他的教会的界限,他最发自内心的言论,听起来仿佛出自异教徒之口。他所期望的是,既保持对自己的信仰的真诚,又能仁慈对待不赞成自己信仰的人士。他既不赞成教会开除教徒教籍的权力,也不赞成惩罚教徒的失误,他宣称,教会最需要的不是战胜什么,而是自由。他透过他的朋友弗勒里(Fleury)和舍弗勒瑟(Chevreuse),支持召回新教徒,他建议应该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也希望世俗权力超然于宗教事务之外,因为权力的保护会导致宗教上的奴役,而权力的迫害则会导致宗教上的虚伪。有那么几次,他似乎已经逼近了国家和教会应该分离这么一个尚不为人知的思想领域的界限。

费纳隆曾经写道,历史学家应当在自己的国家与别国之间保持中立,他希望政治家也具有这种素养,因为爱国主义不能解除他对于人类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除非这场战争纯粹是为了自由而不得不应战。费纳隆希望法国放弃它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曾为之自豪的领地,尤其是应当从西班牙撤出。他宣称,西班牙人是堕落而弱智的,但这并不能赋予违反势力均衡和各国安全的做法以正当性。在他看来,荷兰似乎是欧洲的希望,组成一个同盟把法国王室从西班牙驱逐出去是正当的。出于同样原因,他也认为,没有任何法律能够证明菲力浦二世要求占领英格兰的诉求是正当的。他希望他的国家采取一种真心谦卑的姿态,他对胜利可能会对好胜的法国人的气质产生的影响深感惊恐。

费纳隆断言,权力是毒药。而由于国王几乎都很糟糕,所

以,他们就不应该进行统治,而只能执行法律。因为野蛮人的标志就是遵守先例和习俗。文明的社会必须由坚实的法典来管理。能够防止专断权力的,没有别的,只能是宪法。在他看来,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令人厌恶,是无耻的,也是国家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根源。如果本应属于国民的统治权力被归还给国民,它就能够通过自己行使这种权力而拯救自己;而绝对的权力却无可挽回地侵蚀它的根基,这种权力正在招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不会是温和的,而会摧毁一切。尽管费纳隆并不希望看到君主制或贵族制被埋葬,但他对自己以醒世危言的方式预见到的几种趋势却表示出某种同情。他承认自然状态,并认为市民社会不是人的原始状态,而是从野蛮生活到农业时代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希望将治理的权力交给地方和中央的国民会议;他要求保证完整的商业自由;教育应当由法律明文规定,因为孩子首先属于国家,其次才属于家庭。他没有放弃通过国会的法案来使人向善的希望,他相信公共机构是塑造个人的性格、使他与遥远的未来保持尽可能密切关系的手段。

他是革命思想理论上的奠基人。尽管人们对他的真实看法所知不多,但他却被人们广为传颂;然而,有一些人则控诉说,费纳隆的力量是一种离心离德的力量,他们也抱怨,国家需要靠自由与正义来维护,同样,教会则需要靠谦和与荣誉来维护。这些人经常告诉我们,路易十六的灭亡正好为他的祖先们赎了罪。他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他把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力使用得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权力本身已经声名狼藉,已经遭到了破坏。而使他们声名狼藉的一位就是费纳隆。在他出现之前,最能干的人,博絮厄、甚至贝勒都推崇贵族制度。费纳隆对这种制度的打击则登峰造极,他对无

比高贵的路易十四的态度,比伏尔泰的门徒们对待十分堕落的路易十五的态度还要严苛。从他开始,嘲弄和羞辱君主的态度流行起来。他后面一代人中最聪明的人都以他为楷模,将反对的基础建立在宗教动机之上。他们跟红衣主教杜布瓦斯(Dubois)所描写过的异想天开的康布雷(Cambrai)大主教一样,是跟他做着同一个梦的梦想家。不过,到了那个世纪中叶,在那场巨变之前,他们的影响逐渐衰微了。

从那时起,怀疑宗教的情绪就大行其道,连那些并没有公开攻击过宗教的人士,比如孟德斯鸠、孔狄拉克(Condillac)、杜尔哥(Turgot)等人,也都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种气氛政治上的结果就是:人们认为有关教会的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而也从来没有对教会与国家得出明晰的概念,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树立国教或废除国教;人们从来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解决办法,或者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决定这些问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这种知识上的缺陷显示出了其致命性。关于国家与教会间关系的理论与宗教宽容理论有密切关系,而关于宗教宽容问题,18世纪的研究只是断断续续的,总是受到妨碍,其看法也不尽科学。由于宗教自由同时涉及宗教和自由两种东西,因而,在意见领袖们那里,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来没有成为不带感情色彩地考察研究的对象。他们更喜欢怀疑一个论点,而不喜欢确信一个论点,他们试图通过驱赶神启来挫败宗教不宽容,就像他们曾试图通过驱赶魔鬼来挫败对巫婆的迫害一样。在他们的自由主义中,依然存在着一个缺陷,因为脱离了信仰的自由,就是将其大量实质性内容拿走了的自由。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其解决办法也不需要那么激进、那么深奥。当时就已经有一些学者粗略地形成了某种看法,后来又由托克维

尔将这一看法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宗教内部尚未形成自我治理力量的地方，恐怕还没有为享有自由做好准备。

这早期的改革观点在法国继续发展，这些观点试图利用现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利用议会制的贵族制度，复兴（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法国议会和各省立法议会。但继续延续古代制度、在古老的制度基础上安放一个新法国的计划，却必然面临这么一个事实：这些制度在法国不管有过什么样的发育，后来却都受到妨碍而停滞下来。因此，假如中世纪的政体确实能够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也是其他国家采摘到了其果实，因为在这些国家，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些观念了。因此，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模仿外国的典范；我们可以说，这种想法从18世纪就出现了。伏尔泰第一个提出，英国具有优越性，孟德斯鸠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英国最近已经创建了一个政府，比仍然停止在古代的法国的制度要强大得多。尽管是靠欺骗和叛逆，但它却确立了法律的保障，并且比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根据正统性、根据继承权或宗教认可所建立的所有制度都要稳固。这个国家的繁荣依赖的是人们尚不熟悉的信念：神学上的争吵并不会分散国家的力量，而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正是其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那个生性多疑的人（指克伦威尔）完成了这场巨变，并统治了16年，他成功地维护了公共秩序，尽管是用阴谋和反叛；英国人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国家信贷体系，并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获胜。（1688年革命以后）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学说（Jacobite doctrine）是欧洲君主制度的基石，它一直是由法国的军队来捍卫的，但它却没有能够撼动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一场伟大的试验让人们有了全新的发现。一种公然违背几个世纪以来的智慧的新奇的经验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就确保社会稳定而

言,革命已经成为比传统更能奏效的原则。

孟德斯鸠试图让政治科学中被搞混的事实重新发挥作用。他珍视政治科学,因为它能使他与君主制和谐相处。他最初的信念是:国王是一种恶,而且不是一种必要的恶,他相信,他们的末日就要降临了。而他在走访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年,英国辉格党领袖,1721年成为英国第一任首相,任职至1742年——译者注)时代的英国之后,形成了一个新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他决定暂缓判决那些国王的死刑。他一直宣称,共和国乃是美德的统治,他所说的美德就是热爱平等,抛弃私我。但他看到的却是一个由于腐败而繁荣的君主制。于是,他说,君主制的突出原则不是美德,而是荣誉,他曾将其描述为一种精心设计的装置,驱使世界上最能干的人不受惩罚地从事一切令人反感的事情。用气压和纬度解释制度与民族性格的那个著名的理论,对英国的赞赏并没有伤害法国人的爱国精神。孟德斯鸠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社会政治制度,他却没有更进一步利用那令人尊敬的才能对于所有实证性事实给出理由,有时他所捍卫的论点却让他提出的事业陷入困境。他对那么多要求获得特权的借口非常了解,他几乎完全忽视了没有任何特权的那个阶层:由于对教士阶层没有好感,因此,他赞成给予他们豁免。他认为,仅靠贵族制度就可以维护君主制,并且正是这一点,使英国比其他国家更为自由。他阐明了伟大的保守主义基本原理,而一般来说,它要成功,却必须深入地了解施行这一原则的时代;在他的著作中,他阐述了最纯正的辉格党人的原则,如果公民的义务遮蔽了其作为人的义务,那么,公民的这种义务就是一种犯罪,这也是费纳隆的看法。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自由哥特式的自由(含有中古、野蛮、粗野的意思——译者注),而不是贪得无厌

的自由。但他的著作中的格言 *Prolem sine matre creatam* 旨在表明,唯一应当追求的东西就是自由;而他关于税赋、平等、权力分割的观念,使他在 1789 年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然而,他提出的忠告——单一的立法机构可能比行政机构更为危险——却无人记得。1767 年,他的《法的精神》就失去了风头,当时卢梭如日中天。卢梭的精神一直活动在他所熟悉的社会状况中,并没有留意到即将到来的民主制度。他向休谟保证说,不会有什么革命,因为贵族们并不具备公民的勇气。

达尔冈松(d'Argenson)更有预见性,他于 1745 年任外交大臣,他是从政府内部观察政治的。他那位聪明的同代人只是默许承认革命的可能性,而他则有意识地提出了一个实行根本变革的方案,我们可以从他的方案中看到 1789 年制度的最早的雏形。在他之前也有些人认识到革命迫在眉睫,但只有达尔冈松预言说,这场革命将以巴黎街头的教士遭到杀戮而拉开序幕。三十八年后,这一预言在圣日耳曼大修道院变成现实。他没有受到亲英思想的多大影响,他是那位觊觎王位者(克伦威尔)的支持者,他没有将革命归咎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Deist)和辉格党人,而是归罪于教会及其分裂与不宽容,他认为拒绝信仰的精神既危及教会也威胁到国家。在欧洲大陆,人们一般都认为,1688 年的革命是不信奉国教者发动的一场起义,辉格党则在安妮女王驾崩之前被认为属于长老会。人们很容易推断,更为狂暴的神学争论必然会导致更为狂暴的动乱。早在 1743 年,在他那可怕的预言中就指出,国家将土崩瓦解,他对于这种结局确信不疑,并开始思考在其他的统治者下面寻找一个避难所。他希望废黜贵族、教士和律师,将他们的权力交给群众。尽管政治科学还处于婴儿时代,他却根据刚刚诞生的启蒙运动思想论证了理性的自由和所有阶

级、宗教一律平等的思想,认为这是政治的完美状态。这个世界不应当由羊皮纸和既定权力来统治,而应该由清晰的理性来统治,这种理性能够化繁为简,能够拆除横亘在国家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一切东西,给予每部分国民以治理自己事务的权力。他渴望改变一切,只有君主制度除外,因为只有君主制度能够改变一切。具有审议权的立法会议(deliberative assembly)的水平不会比其社会普通成员的水平更高。它既不会很愚蠢,也不会很明智。如果国王使自己成为理性(philosophy)和正义的不可抗御的工具并致力于改革,那么,就可以万事大吉。但他的国王却是路易十五。达尔冈松觉得没有多少东西值得保留,他不能不退而作出全面的判断和抽象的命题。他信奉理性主义,他对于习俗的成见和财产权漠不关心,他提出了一条基本原理:可以设想,每个人都能理解涉及他自己的利益和责任的事情。他对民主、平等和简单性的狂热辩护,他厌恶横在中间的权力,凡此种种都表明,他不属于他那个时代,而属于下一代人。他预示了那些历史事件的到来,但对那个时代却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因为他的著作充其量也是到我们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

就在孟德斯鸠达到活着的学者所能获得的声望的巅峰状态、满足于思考历史之际,在巴黎神学院有一个学生则教导人们,将自己的希望和努力投向未来,他在23岁的时候就开始指导着这个世界。当杜尔哥宣称,不断的增长和进步是人类生活的法则的时候,他正在攻读神学课程。我们生活在科学的时代,很难设想除了心灵之外没有发展、没有改进社会的能力的基督教世界。然而,这种观念被人接受的过程是很缓慢的。在原罪的重负下,人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堕落的。每一代人都承认,他们是他们的父母的微不足道的孩子,都急不可耐地等



待着末日的降临。从卢克莱修和塞涅卡一直到帕斯卡和莱布尼茨,我们只能看到,学者们在若干零星、孤立的段落中提出了人可以趋向于完美状态的观念;照耀人心的这些光亮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但它们却没能占据主流地位,也没有大放光明。杜尔哥则很快使这种观念广为流传,在好学深思的才智之士中间,产生了强大的穿透力,而新的科学的兴起又确证了这种观念。他给予历史以深层的意义,给予其以统一的趋势和方向,历史的运动获得了一种连续性,历史是在发展,而不是在任意变化。他所说的进步既指知识,也指道德。他公然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恶棍对于以前的世纪来说,也可能是神圣的榜样。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人的邪恶。他的分析给未来的探索者们,为莱辛、更为黑格尔留下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不过,他教导人类要认识到,未来跟过去不同,未来要比过去好,历史上的经验可以作为经验或教训,但不能让它来指挥或控制未来。他显然大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研究;但他也锻造了一件武器,一件具有清除历史产物和现有秩序的武器。历史具体体现的是不完美状态,而摆脱历史的束缚就成了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口号。这位大师的弟子孔多塞就认为,烧掉整个历史记载,就能使世界获得解放。

杜尔哥还是相当慎重的,尚没有到如此过分的地步,他还到历史中寻找能证明他的法则的证据。他最早在神学研究中偶然提到了这些,他很快就放弃了神学研究,他说,他不能戴着一个面具。基佐(Guizot)曾经把拉芒内斯(Lammennais)称为坏蛋,因为他扔掉了自己的教士法衣,而成了一位自由思想家,经历跟他差不多的舍雷(Scherer)曾评论说,“他恐怕不知道那件衣服值多少钱”。而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在杜尔哥那里,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完成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